

#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 批判的三条路径

孙颖 韩秋红

**【摘要】**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是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主题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现代性价值体系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主要形成三条批判理路：一是哲学维度的理性主义批判。针对启蒙理性这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让现代性的理性理念以完整形态得以正确应用的发展方案和主张“瓦解的逻辑”的否定方案，在关于启蒙“再启蒙”的思辨中走向重建与解构的分野。二是经济学维度的普遍异化批判。从“物化”到“新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时代社会关系异化普遍化的进程，以价值批判立场要求人的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复归。三是政治学维度的极权主义批判。从“新控制形式”到“生命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揭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假性及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极权主义危机，对现代政治持怀疑与否定态度，将建基于主体间包容性的参与式民主与新社会运动视为个体与共同体“和解”之路与期许。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本土化中的批判特色，但其马克思主义底色的缺失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色的销蚀则需引以为戒。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异化；生命政治

**【作者简介】**孙颖，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师资博士后；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吉林 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23.12.109~119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20JZD008）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项目编号：22YJC710060）的阶段性成果。

自卢卡奇 1923 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初版至今，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走过百年理论发展历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之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之辨深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和“世界化”进程之历史分期的理论解读，同时也表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范式特征或理论样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兼具“历史逻辑终结”与理论逻辑延展的藕断丝连。其中，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能够延续至今且有声有色的重要批判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迄今针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展开的多维度多视角的批判遗迹及其

形成的批判理路，对再度审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外在社会问题及内生矛盾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对证析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与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具有参比价值。

## 一、从“总体性辩证法”到“空间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路径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发端于西方认识论哲学对主体理性的觉解与高扬。启蒙理性构成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为现代性提供了自我确证的依据，理性的内在本性也规约了现代性的辩证特征。随着认识论哲学将主体理性推向“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

德立法”的理性主义高度,现代性的自我背反也以“启蒙倒退成神话”表征开来。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成为现代性同化逻辑的观念依循。然而,这种同化却建基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因而在现实中表现为同化与对立的悖论,导致均质化与两极化并存的吊诡,使得现代性催生出碎片化的精神紊乱。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在哲学思辨的维度总是要追问现代性精神内核的错置,以思考如何对启蒙进行“再启蒙”从而实现理性的自我救赎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突破与超越。

总体性辩证法对历史主客体统一的修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社会整体陷入物化命运和异化危机的过程中,认为社会普遍的文化意识形态长期被主客二分的形式思辨逻辑所支配,构成无产阶级无法冲破内外束缚而实现自我解放的思维观念因素。对此,他们强调回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社会存在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将主体置于社会历史中加以辩证认识,使主体不是在占有和支配客体中以理性的优越性自我确证,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我们在这里的基本前提是相信,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已经被发现了。这个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所以不言而喻,它必须被经常运用于自身。”<sup>①</sup>卢卡奇用总体性范畴修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辨形而上学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的两个极端,以总体性辩证法重新论证主客体在历史中的统一和历史本身的主客体统一逻辑,以此为无产阶级提升阶级意识、确证自身历史主体地位提供支撑。在其语境下,具备自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代性规制的社会力量,但这一力量始终要倚靠历史总体性的辩证运动达到一定程度的意识自觉才能得以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总体性范畴及其辩证法观念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整全理解,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替代性方案体现了其自身一以贯之的总体性辩证批判逻辑。

在展开现代性的历史哲学批判、文化价值批判、社会现实批判过程中,这一思维逻辑体现出对现代性本身的辩证认识,即认为现代性危机并非意味着现代性本身是错误的,而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错用或未达至自身的整全样态而形成的问题。“与其说当前的危机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需要反身性地将现代化本身纳入其自身的行为领域,即将合理性本身加以合理化。”<sup>②</sup>他们总能发现理性现代性内在的二元对立及其自我悖谬的特征,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认知-工具理性与道德-实践理性等,从而以总体性原则提出对立之和解的再启蒙方案。然而,总体性辩证法逻辑下的历史替代方案最终无法避免走向乌托邦的遐思,尤其是将历史必然性寄托于逻辑机制而非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上,使之难免落入“文化大拒绝”某一偶然历史时刻降临的空想俗套。他们没有真正贯彻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一以贯之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中的辩证法,而非作用于历史的辩证法。

否定辩证法对同一性逻辑的颠覆。卢卡奇开启的总体性辩证法逻辑理路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开辟并奠定了一条延着“正-反-合”线性逻辑面向和解的现代性修复之路。高兹提出要对现代性这一“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新旧交替的结果”,对现代性的批判“切勿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并倒掉”等主张;哈维指出“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sup>③</sup>等,均体现出对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辩证逻辑路向。但这一路向在本质上具有倒退回黑格尔的嫌疑,即强调逻辑自律自洽的合理性规划在必然性的自我运动中不断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在阿多诺看来,这再次陷入同一性逻辑的霸权狡计。以肯定性的最终指向规定着同一性的逻辑轨道,同化一切差异性存在,成为现代性无

法自我超拔的意识形态弊病。他批判道：“只要意识按照自身形态必须追求统一性，差异的东西就表现为歧义的、不一致的、否定的；只要是与意识不同的东西，意识就用总体性诉求来衡量它。”<sup>④</sup>要想使身陷现代性同一性逻辑束缚的主体得以解脱与超拔，必须要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辩证法的肯定性意向，在否定性中介的地基上重新构筑面向差异、多元、批判的开放的新场域。对此，阿多诺提出以“规定的否定”为核心的“瓦解的逻辑”，破除基础本体论范式，以规定的否定重构观念的秩序。从本体意味而言，否定辩证法将传统辩证法确定性的预设基点置换为不确定性的中介基点，强调辩证法是向否定性敞开的无始无终的“没有立场”的矛盾运动，主客体之间不存在优先论，即便存在也应是面向经验事实却又受制于主体中介的“客观真理”，即绝对客体优先性。从逻辑准则的意义而言，否定辩证法要求解蔽被肯定性同一逻辑工具化的否定介质，强调否定不是辩证法的中间环节，而是构成辩证运动的规定所在。在其看来，经由否定之否定以达到肯定的逻辑归宿要么是受制于“世界精神”的附庸，要么是无尽的循环论证。为了打破这一肯定性的逻辑体系，否定辩证法必须以“反体系”的精神批判体系化的总体性规划。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否定辩证法在根本动摇体系哲学思维的绝对“否定”中使否定陷入无根的自我循环，对否定的绝对肯定使之滑向了另一个极化的“反体系的体系”。某种意义上，否定辩证法所内蕴的开放性、包容性意识与要求开掘差异性、批判性的意志具有前瞻性，却难免是思辨抽象的。“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的否定辩证法，由于自身的否定性而使这个基础建立在沙滩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辩证法不仅没有建立起来、反而解构了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sup>⑤</sup>否定辩证法走向了自我瓦解的结局，但也为现代性批判延拓出不同于总体性辩证逻辑的否定路线，影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浓郁的后现代色彩。其所强调的否定性、差异性、瓦解

同一性逻辑的思维方式，为社会反抗意识提供新依据，为当代西方激进民主运动对差异性平等的要求提供理论支撑，也在文化审美领域为突出自我特性的后现代风格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加持。即便如此，否定辩证法的批判限度也昭然若揭，即在否定的普遍化中走向无差别的肯定，无标准的否定再次转化为抽象的肯定，从而助长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动荡。可以说，否定辩证法深化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洞见，但因其思辨思维方式的限制而在“哥白尼转向”的基础上自我倒转，无意中同后现代主义同流为解构一切也解构自身的极端。

空间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爆发多重危机、表现出新特征新局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受到西方学者的重新审视，以往的线性历史思维无法给出现代性救赎的有效出路且走向自身的逻辑终结，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适时地发生空间转向，从空间维度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探寻新的逻辑视野。其“空间化的本体论”重构与空间辩证法的建构凸显出后现代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否定辩证法的否定之规定性的一种空间化的扩张。列斐伏尔认识到日常生活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赖以扩张的新空间，通过日常生活殖民化的现代性批判视角，从现象层面对消费关系再生产范畴的空间扩张的批判，深入到思维观念层面关于辩证法的重新建构，主张辩证法需要根本转变以往的历史时间逻辑，开掘出空间维度，才能准确认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问题——“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与历史性时间相关联，或者与诸如‘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时段性机制有什么关系了……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通常是指什么，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恢复……这就是从精神的走向社会空间的过程……”<sup>⑥</sup>列斐伏尔在历史、社会之外开掘出空间维度，强调空间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关于“历史-社会-空间”的所谓“三重性辩证法” (triple dialectic) 建构中为空间批判理论奠基了基本

的分析范式。其后,沿此新时空范式和空间辩证法的批判路向,逐渐衍生出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思潮,对三者关系解读的差异也拓展着空间辩证法的批判视域和理路。哈维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尝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人文地理学补充,强调空间相对于社会历史的从属性,解蔽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而非反驳历史唯物主义的去空间性,以此展开对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空间结构性矛盾的现代性批判,在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景观的社会批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辩证的空间乌托邦构想。苏贾则在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辨别厘析中肯认空间的本体论地位,强调空间、时间、社会三位一体的互构关系,要求从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三重维度辩证地看待物质世界及其各种关系,提出“第三空间”认识论,主张用“第三空间”超越和修正僵化的二元论思维中社会历史与地理空间的物质形式变迁与意识形态结构,要求形成更为立体的空间认知模式。空间辩证法实际上强调的是回复辩证法的开放性特征——“生活世界是彻底开放的,而且是开放的彻底;生活世界无所不包,它们超越所有的学科领域,同时又以政治为中心并对战略选择很敏感;生活世界永远不能被彻底认知,然而关于它们的知识又能引导我们在奴役中寻求变革、解放和自由。第三空间就是这种生活世界的无限构成,而理解第三空间就必须运用三元辩证思维。”<sup>①</sup>可以说,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开掘和建构“历史-社会-空间”三元辩证逻辑,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基于时空观变革的新认知模型,但在此过程中凸显的后现代主义特点也存在并产生架空和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嫌隙。

由于启蒙理性的自反性危机构成现代性危机的观念机制而受到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广泛质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中,给出了总体性辩证法的修复路径和否定辩证法的反叛破解路径,两条线索分别在对现代性不同的理解模式和理论态度上延展着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路,并随着时代发展而衍生出空

间辩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虽然逐渐显露并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趋势,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持辩证认识的基本立场贯穿始终,尤其对现代性理性理念的形而上追求,强调现代性的外延即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理性现代性以整全形态发挥正向效能的观念秩序,因而必须实现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才能真正激活现代性的美好本原。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但是,其在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多元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警醒我们需不断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对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及价值体系加以勘辨审度。

## 二、从“物化”到“新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判路径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的生存境况的畸变是马克思主义展开哲学反思与批判的时代关照,体现出对经验现象世界的价值关切。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人民物质利益及权利问题的体察与洞悉,促使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中,以唯物史观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论指导,审视与反思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境况与生产生活方式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价值关照。因而,劳动异化批判、商品拜物教批判成为直击社会现代性病症的重要思想遗产,为西方知识分子针砭时弊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在关于人与社会的异化及其本质复归的理论路线上延展着这一面向社会现实的价值批判传统。

社会关系的“物化”及生产领域的异化批判。卢卡奇针对商品形式普遍化的社会关系物化现象直言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代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sup>⑧</sup>沿着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路,卢卡奇回到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主客关系,指明发生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物化关系。劳动者生产主体在机器大生产中被机器支配,在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发达商品经济社会中被商品支配;存在质的差别的具体劳动被物化为以量的计算公式合理化的抽象劳动。在机械的计量规制下,工人受严苛的官僚组织管理,被物化为仅为提高生产率而被计算和被使用的生产机器。商品形式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导致结构性的物化意识。在卢卡奇看来,最终以孤立化原子化显现的社会成员的普遍物化命运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结构“自然规律”造就的商品范畴的普遍化。通过工人仅剩余劳动力这一可用于计算并进行交易的价值量之物而言,其表征的社会结构在于——“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sup>⑨</sup>卢卡奇通过历史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试图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重构社会存在本体论,探寻克服异化的应然的社会秩序和人性本质的复归与解放路径。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卢卡奇所揭批的以精于计算的合理化原则打造出的资本主义商品物化结构蔓延至非物质劳动主导的新生产方式中。在晚近的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劳动产品及劳动形式甚至生产过程发生根本变化。劳动产品以非物质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劳动形式以智力、情感、语言、信息等非物质形式逐渐代替纯粹体力劳动形式成为主要的劳动范式;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越来越发达,诸多传统流水线生产的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所取代。生产领域的非物质化进程整体改变着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它既生产产品,也生产社会关系,同时生产社会生活。哈特和奈格里揭示了这种在非物质劳动范式下进行的“生命政治的劳动”重构着主体及其社会历史地位。“我们无法在生产性主体

与被生产出的客体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生产过程。相反,在这里,不管是生产者还是产品都是主体:人们在生产的同时也是被生产出来的。”<sup>⑩</sup>而在资本逻辑的规制下,剥削与支配的对象也从生产性活动延伸到生命本身,即在以往工厂工业生产中劳动者被还原为量化的劳动力基础上,非物质生产性的劳动者的生命体征也被归化于资本计算的合理化公式之中。人在生产劳动之外的情感、智力、语言、交往、行为等生存方式甚至生命体征都成为了资本剥削的对象范围。生命本身被统摄于商品形式并被量化用于交换。虚伪的主体外壳已不再能够满足异化的侵占与蔓延,资本使生命赤裸裸地暴露于金钱关系之下。非物质劳动批判再次转向异化批判的价值向度,以主体生命政治潜能探讨本质复归的可能。“在分析生命政治的生产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被迫从剥削概念转向异化概念,这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轨迹正好相反——当然,我们并没有回到他早期的那种人道主义理论。”<sup>⑪</sup>在进行非物质劳动及其生命政治批判中,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比卢卡奇走得更远,而是从劳动范式和生产方式的“类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度转回主体异化的逻辑上,强调资本的霸权属性及其制度下商品形式渗透于生命各个环节的普遍社会现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沿着卢卡奇的路线,将解放方案投向主体意识的唤醒及本质的复归。无论是历史主客体统一的阶级意识还是具有内在潜能的“诸众”,其只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价值批判的对象性群体。

“新奴隶主义”及大众文化的消费异化批判。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持续深化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矛盾的政治经济批判,但其关于商品形式普遍化的理论研判深受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滋养,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使经济社会结构性地陷入商品形式统治的根源。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泰勒制、福特制到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制,从物质生产到非物质劳动、数字化劳动、数据生产,无论劳动范式与生产实践具体随着生产力和时

代变迁有何质性变化,一切社会生产活动却始终围绕资本增殖的目的,一切社会存在被资本逻辑的合理化原则吸纳为可量化的商品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样一种商品结构下的物化命运渗透于人的日常生活,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管控整个社会的运行,形成资本对“日常生活殖民化”的结果。对此,情境主义者以“景观社会”斥责资本主义采取工具理性的手段,以景观拜物教逻辑制造萦绕人的日常生活的虚假需求来消化其过剩危机;空间批判理论从空间生产的维度斥责资本对自然物理空间的赋值买卖,对社会空间进行碎片化切割的资本主义管理等。随着技术革新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再生产过程按照消费主义支配的“自然分工”分化出不同于产业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新的社会阶层对立关系,即精英阶层与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社会两极分化以新形式继续加剧。“对经济领域中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由技术发明所创造的自由时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境:一部分人能从另一部分人那里购买到额外的空闲时间,而后者沦为只是替前者服务。……对于提供个人服务的那些人,这种社会分层也就是服从于和人身依附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曾经被战后工业化所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了。”<sup>②</sup>对于消费社会而言,闲暇时间的多少成为判别社会成员社会阶层地位的标尺之一。底层从业者不仅要从事屈从于、依附于雇佣者的服务工作,导致业余时间也被资本裹挟的社会再生产所挤占,而且其微不足道的闲暇时光也充满着消费主义陷阱。人们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所引诱,接受以消费能力评判幸福指数的价值标尺,成为资本主义延缓经济危机的工具。与此同时,资本侵占的触角伸向文化领域,助长消费主义价值标尺的社会习俗风气。文化的产业化、商业化进一步强化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精神腐蚀,追求肤浅的快感满足、欲望满足的俗化的“大众社会”得以形成,消费成为释放工作压力与劳动疲乏的精神鸦片,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成

员对商品化及资本运行机制的认同,隐藏了自我异化的压抑性社会心理。针对消费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大众文化批判提出了“废墟的寓言与美学话语救赎”“反艺术模仿之‘谜’的否定性真理”“文化大拒绝”“审美乌托邦”等批判话语,展现怀古伤今、眷恋传统与否定性回护、扬弃式修补的对现代性出路的抽象的人本复归的踌躇之思。

加速社会及大众心理的“新异化”批判。通过物化与商品化的延展实现资本积累与剥削的扩张,以及通过灌输消费主义观念辅助延缓过度生产与过度积累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不断取得自我调节的暂时性胜利。但侥幸的代价则是异化的普遍化。在逻辑上沿着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的理路,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的新表现、新形态、新特征,往往找寻到劳动异化批判的现实映射。从“物化”到“消费异化”,从“单向度”到“景观社会”,从“生活世界殖民化”到“空间生产”,从“文化工业”到“符号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在资本逻辑主导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剥削关系逐渐扩张,异化现象也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范式的变化在资本增殖的利润机制中弥散,侵占到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各个环节。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生产技术进入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异化的表征也延伸到虚拟经济和数字资本及其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数字异化”的特征。在揭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化问题时,主要是以关系的范畴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吊诡。但行至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异化普遍化的“极限”临界,即“无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losigkeit)这一“新异化”表现,当下的异化达到排斥人的“多余性”的极端境况。“异化意味着人们经验过程的停滞,那些异化的人无法建立与既定社会的联系,或者适应它们。”<sup>③</sup>人不是在被视为理性主体的基础上被迫卷入异化关系的相对客体的存在,而是在资本增殖目的及其合理化形式统治中直接以客体形式被驱逐出不

符合计算规则的公式之外。换言之,以往处于劳动异化关系中的人虽然失去了理性主体地位,但尚存社会交往关系这一属人的社会性,而当下甚至连生成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也不复存在。那些“多余的人”被直接排除于社会关系之外,作为“社会剩余物”被资本进行霸权统治、强制侵占、暴力排挤、政治区隔,比如无国籍者、难民等社会边缘群体。这样一来,人们为了不被社会所淘汰,必然要紧跟资本增殖速度的加快及其带来的社会节奏的加速而自我强迫于世俗浮沉。这导致并加剧了社会心理压抑,使异化深入到普遍的个体内心深处并影响其行动抉择,形成“人们自愿去做他们不‘真的’想做的事”<sup>⑧</sup>的“新异化”形式。而这一新异化表征在表象上貌似回归于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的现代性的速度要求及其加速模式,但其深层的本质原因依旧离不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竞争压力与环境——“从逻辑上看,这个发展已经没有另外的终点了,所有的加速机器的个体能量和竞争能量,最终都被献祭给宛如仓鼠滚轮的社会经济竞争。当然,这已等同于完全丧失自主性,彻底背离了现代性的承诺。”<sup>⑨</sup>对此,罗萨等人提出修复“水平共鸣轴”“垂直共鸣轴”“对角共鸣轴”互动互构的“三轴”“共鸣关系”形式,以重构主体与外界社会的联结关系、场域,回应表现为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等系统性新异化现象与结构及加速时代的社会心理扭曲危机,追求一种基于社会内需的“后增长”经济形态,重新激发“主体自觉”的人性,以此发动集体性社群的文化变革和政体改制,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客观必需”。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下持续延展着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路向。他们关于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形成“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决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

在或社会关系。然而,他们对价值批判的理论关注程度的偏斜使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在其西方哲学语境和背景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抽象的人本主义批判立场的强化使之经济学批判的深度不足、力度不够,遮挡了一层“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面纱,使之宣称的亲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之路在革命实践选择上立场不定、态度朦胧,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基础和科学力度,需要进行批判性审视与选择性镜鉴。

### 三、从“新控制形式”到“生命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批判路径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sup>⑩</sup>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剥削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的社会关系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同体结构及其秩序中确立并巩固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sup>⑪</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积累与剥削能够持续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离不开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管控,一是形成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及其利益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政体吸纳;二是引导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认同,使市民社会能够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被塑型和创造。如布罗代尔所言:“如果没有社会的积极配合,少数资本家要独占利益,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资本主义势必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甚至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文明,因为整个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sup>⑫</sup>但这样一来,势必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性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激烈矛盾。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边挖掘资本主义现代性机制下个体与共同体张力关系的表征,一边探寻二者和解的道路。

针对虚假共同体的技术官僚统治批判。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对外殖民扩张的野蛮行径,或作用于劳动者及劳动生产过程的科层化官僚主义管理模式进行直接的剩余价值剥削,在更为发

达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也发生了隐匿化、无形化、系统化、自主自律自动化的变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新控制形式”主要表现在资本对科技的工具性应用和对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用上。“现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形式。”<sup>⑨</sup>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质性提升,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人们的信息获取量、信息传递与交换速度、信息传播渠道与媒介均发生根本质变,加之社会普遍文化素质提高,使得以简单粗暴地掠夺、侵占、强制为手段进行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的强权统治已经过时,掌控技术权威和社会舆论则成为维护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对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应用,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化、功能化,尤其是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纳入资本逻辑、投入资本主义生产,用资本赋予科技以价值、用科技提升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生产效率,从而为资本增殖服务。另一方面垄断科技解读的权威,形成技术专家政治。资本与专业的共谋在社会层面排挤非技术与反技术的社会群体,制造“技术边缘性群体”。他们用专业术语垄断技术应用与社会生产生活的的话语体系,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达到技术霸权的统治效果。同时,借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作用,强化一切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灌输:一方面使政治媒介化。运用企业政策、外交策略、亚文化群体、工会等社会媒介,以表演、排场、个人魅力、修辞等形式,生产政治形象、强化政治权力,达到政治去政治化的效果,使打造政府形象重于政府实际行政实践及其社会效能。另一方面使媒介政治化。对各种形式的大众传媒进行意识形态过滤或权力操控,使之起到为统治阶级辩护的作用。资产阶级通过大众传媒将政治去政治化,并将大众传媒为代表的社会舆论进行政治化,实现渗透与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目的与效用。“媒介只产生拟形,并停留在这一语境:它们既创造现实的强化形式又创造现实的替代品,但却不能达及现实。”<sup>⑩</sup>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政治共同体承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好生活

向往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兑现,甚至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及资本逐利的政治外衣。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技术霸权等新霸权形式成为虚假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工具,形成“新控制形式”对社会系统的单向度的极权性统治。即如马尔库塞指出,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生产机构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有助于促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更有效、更令人愉快的新形式”<sup>⑪</sup>。

针对个体虚假认同的社会心理机制批判。虚假共同体对社会的全面掌控实现自上而下的对个体的压迫。然而,虚假共同体仍然能够长期存在而未能受到来自社会反抗的撼动,说明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得到了普遍认同。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个体心理机制的本质变化及其背后蕴藏的资本逻辑对生命政治的剥削,形成了个体对共同体的虚假认同。如葛兰西基于东西社会结构差异的分析认为,得到或操纵市民社会的文化认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关键,因此主张在市民社会夺得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社会认同是如何实现的,在社会心理机制批判方面得到法兰克福学派及生命政治等批判理论的深入关注。一方面,从个体追求自由与恐惧自由的矛盾方面,弗洛姆等人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逃避自由”的悖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资本主义现代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性主体为基础的个体自由,其市场规则、雇佣劳动关系、代议制民主政治等社会组织形式均建立在理性个体的自由身份基础上。然而,这种自由却在现实中表现出虚假性,即人们逃避由自由权利带来的社会责任。易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获得的所谓自由仅局限于经济独立,而缺失政治向度,体现在人们对由部分的自由权利的实现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不安感与恐惧感,由此选择从众以

换取心理慰藉。另一方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不仅是个体自身的一种心理畸变状态,其背后也具有共同体施压的资本功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中,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治理模式是一种官僚组织原则下的极权体系,通过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环节的权力“装置”并借助排斥生命本身的“规训与惩罚”机制编织社会成员的存在形式,实现生命治理术。“在第一种对肉体的权力形式(以个人化的模式)以后,有了第二种权力形式,不是个人化,而是大众化……它不是在人-肉体的方向上,而是在人-类别的方向上完成的……它不再是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而是我所说的人类的‘生命政治学’。”<sup>②</sup>对此,无论是以积极态度认为生命政治具有反抗压迫的潜能,还是以消极态度认为生命政治受到虚假共同体的全面宰制,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生命的虚妄及其非理性的极权主义倾向。

“重建公共领域”与重构革命主体的激进民主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属性渗透于权力达及的任何领域,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被极化与激化。但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如此危重,但正是在个体主体与共同体主体之间的无限张力中能够觅得自由解放的出路。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释放来自社会的主体反抗潜能,提出系统性的文化审美的感性创造力反叛、激进民主运动、社群自治运动等构想,以期抵制资本主义新控制形式,实现主体的真实自由与社会政治解放。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领导权”思想、马尔库塞的“文化大拒绝”、激进左翼的社群政治运动、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运动等都表现出话语批判、艺术审美批判的激进民主立场与倾向。尤其是当代激进左翼的政治批判,向美学领域探求主体冲破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感性冲动,或向人的生命主体本身问询实现自治的“诸众”共同体意识,或向神学政治学祈求解放赤裸生命的弥赛亚时刻的降临,或向历史偶然性的“事件哲

学”召唤历史主体在无限集合中不断填补“存在之空”的偶发机遇……在他们看来,主体自身拥有着反抗本能及潜能,只是尚未达到激发集体行动的临界值,因此需要“新共产主义”理论复苏和“共产主义观念”复兴的冲击,来实现反抗资本主义极权“装置”的突破。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退向文化批判与哲学思辨中,找寻社会思维方式的新变革及其途径,重建社会认知基础。对此,哈贝马斯为之提供以话语政治为特征的交往理性建构的审议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思维根据,提出以主体间的交往理性范式取代长期占据思维制高点的具有主奴关系特征的主体哲学范式。“客观认识的范式必须被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理解范式所取代。”<sup>③</sup>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容性理性,要求主体在主体间的人际交往中确证自身,而不是在支配客体的权威中确证自身。在哈贝马斯的视域下,通过交往理性范式的确立,彼此尊重、相互理解、平等互动的交往行为才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观念根基。而交往理性的实现则需要主体以语言与行动的互动式参与来“重建公共领域”这一政治活动新公共空间或新场域。“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人际关系。”<sup>④</sup>在其看来,交往范式的确立与重建一个平等言说和行动的公共领域相辅相成,二者共同推动着一个主体间互动共同体的生成,以调节由主体中心主义带来的极权危机。在重建公共领域的愿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改良、修正或取缔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而以更加尊重差异性、更能突出实质性平等和真实的民主的参与式民主取而代之。后者不仅是建构公共领域的主要路径,而且凸显了基于主体间性交往理性范式,在共识中达成集体意志的良序政治关系的美好前景与途径,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极权主义危机展开政治批判的主要归宿。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张力关

系中寻找和解之法,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通过不断强化的官僚主义和技术理性统治而加剧着极权主义危机;另一方面反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如何通过将虚假共同体合法化和制造个体虚假认同实现资本主义社会“铁笼”的构筑。在此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制度批判进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大体指出一条“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和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实质”与“形式”的对立,批判现代性所期许的平等、民主、自由等美好愿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真正实现的虚假性,主张激进民主主义社会运动不断突破身份边界的参与式民主和重塑公共领域的企盼。显然,其政治主张建基于否认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认为所谓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分化为若干具有“亚文化”特征的阶层群体或其所谓“二价集体”,底层民众与边缘性群体成为他们所寄托的革命主体。由此渐趋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无法在强有力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团结起最广泛的有生力量,以其所期望的“集体性”激进运动推翻资产阶级专制统治。说到底,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坚定,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仅仅将之作为理论批判的学术工具或寄托美好生活的精神丰碑,在根本上有违“改变世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便难有政治实践建树,遑论解放的乌托邦期许。

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本土化中的批判特色,但其马克思主义底色的缺失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色的销蚀则需引以为戒。在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变

与不变,如何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变与不变,关乎能否有效建立起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集群、能否有效组织起开展长期斗争的政治实践;如何认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如何厘清先发现代化与后发现代化的文明关系,是思考现代性的辩证特征及其理念型的关键之一,也是从文明形态上以社会历史观审视如何对现代性进行现代化的重要向度,关乎能否和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研判。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坚定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决推进社会主义模式的现代性文明形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在这一价值和文明指向上,中国式现代化在理念、理论和实践行动等各个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是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标志之一,体现出重要的世界意义和人类贡献。

#### 注释: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2页。

②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Verso, 1989, p. 1.

③[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页。

④[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页。

⑤王凤才:《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⑥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llison & Busby, 1978, p. 89. 参见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

⑦[美]爱德华·W. 苏贾:《第三空间》,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⑧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9、160页。

⑩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6. 转引自唐正

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⑪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9-140. 转引自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⑫A.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 Verso, 1989, p. 183. 转引自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148页。

⑬Rahel Jaeggi, *Alienation*, trans. Frederick Neuhouser & Alan E. Sm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53.

⑭⑮[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1、114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⑱[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XXX页。

⑲[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9页。

⑳[美]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㉑[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6页。

㉒[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㉓㉔[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47、347-348页。

## Three Paths of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from Western Marxism

Sun Ying Han QiuHong

**Abstract:**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is one of the themes that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arxist theory. Western Marxism mainly addresses three critical paths around the value system of modernity and its internal development logic. The first path is the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In view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the spiritual cor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Western Marxism put forward a development plan to correctly apply the rationality of modernity in a complete form and a plan of denial on the advocacy of the "logic of disintegration". In the speculation about the "re-Enlightenment" of Enlightenment, it moves towards the division into reconstruction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The second path is the general critique of alienation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From "materialization" to "new alienation", Western Marxism reveals the process of the alienation and univers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capitalism from the real economy to the virtual economy, and call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ssence of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value criticism. The third one is the critique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dimens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new forms of control" to "biopolitics", Western Marxism exposes the falsity of capit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totalitarian crisis of the modern bureau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t takes a skeptical and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modern politics, and reg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based on inter-subjective inclusiveness as the path and pursuit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In general, the century-old critiqu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from Western Marxism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theory in localizing it in the Western society, while its lack of Marxist background and erosion of the true nature of Marxism need to be taken as a warning.

**Key words:** modernity;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 Western Marxism; dialectics; dissimulation; biopolitics